

专栏导语

马 骏 何艳玲*

1949 年新中国诞生，无疑是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选择。此后这个国家所走的历程，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社会实验之一。对这场实验进行回顾与总结，既可以梳理已有的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也可以展望未来中国国家建设的路径。

基于对中国国家建设的关注，2009 年 10 月，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公共管理学术峰会：‘中国行政国家’六十年：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逾 50 位公共管理学者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政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社会政策改革、基层社会建设、非营利组织建设、决策过程变迁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路径，探寻了未来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要方向。本专栏选取了在该会议上正式提交的三篇文章。其中，马骏的文章从市场化运动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双向运动”视角阐述了中国近年来的国家重建路径；刘守刚的文章则集中论述了现代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即财政制度，的变迁逻辑；汪庆华的文章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揭示了 1978 年以来中国政治 - 经济转型的逻辑和动力机制。这三篇文章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在 60 年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如何不断调整其治理模式，并希望能在政府 - 市场 - 社会之间，在公平 - 发展 - 环境之间寻找均衡。从三篇文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

* 马骏，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何艳玲，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抽离出如下关于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共识^①：

第一，经过 60 年的发展和改革，中国正在稳步走向富有中国特色的有效治理，职能定位趋向合理，经济显现蓬勃活力，社会领域健康成长。尽管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背后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这是国家进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们需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理性地反思这些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应对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二，中国国家建设的成长方向必须更加积极地回应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实践需求，彰显公共精神对社会的贡献，增强“中国话语体系”下公共行政的成效和价值。改革以来的骤变不仅带来了累累硕果，同时也留下了体制、结构和观念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公共行政学者不仅要从技术上、从方法上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更要从制度上、从根本上促进国家权力的公共化。

第三，中国的国家治理工具有必要走向规范化和多元化，以体现中国式治理的效能，丰富其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回避、打压或者强力清除的治理工具，不仅很难获得多元社会主体的认同，而且会积累更多的、层次更深、破坏性更大的问题。公共管理不仅要在过程上体现“依法行政”，同样也要针对不同程度、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问题提供“差异化”的治理工具。

第四，60 年实践的经验为指导当前的发展提供了“经典教程”。现阶段的发展不仅要直面过去的挫折和遗留的积弊，更要以史为鉴，走出中国国家建设历史上的种种怪圈。在改革的过程中，公共行政学者必须深入了解我们国家历史上的缺憾，研究科学发展规律，指导改革创新实践。

参考文献

何艳玲、陈家浩 (2009). “行政国家”六十年：追寻现代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 11 月 19 日.

^① 以下观点同时参见何艳玲、陈家浩 (2009)，有修改。